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

序

郑伯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有的人的经历，能反映整整一个时代的风云。

一九二六年，党参与组织北伐战争，已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对于是否独立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还在摸索争论之中。而当时华蓥山区的共产党员们在四川党组织的领导下，已开始意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于是就有了本书中所描写的由我党策动并参与的武装起义——以“军团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川北民军起义。这次起义，成为我党直接组织武装斗争的最早尝试之一。

在这次起义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初，华蓥山区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起义。它联合了各派进步力量，在华蓥山区建立了地下苏维埃，大量牵制了军阀杨森进攻红军的兵力，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抗战后期，为对付步步进逼四川的日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王若飞同志曾布置了在华蓥山地区着手加强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准备日寇一旦入侵四川，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整个华蓥山区又燃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烈火，数千人参加的华蓥山游击纵队以英勇的战斗和重大的牺牲，沉重地打击了蒋家王朝最后的巢穴，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主战场上的大进攻，迎来了最后的解放。

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生龙活虎的人物，却逐渐被历史的烟云所掩隐，只有在当地民间的传说中，抹上了越来越浓的神秘色彩。幸好，我们有陈联诗同志留下的这部回忆录。在这里面，她以一个女性的细腻，详尽地叙述了这二十多年里华蓥山地区发生的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叙述了她的亲人、她的战友、还有那些关心她帮助她支持她的人们的许多故事。今天的朋友们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里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对革命的真实态度，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陈联诗带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离开了她那温柔书香之家，走上了一条今天的一些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看了这部书，人们会知道陈联诗的光彩之处，不光是那手好枪法，也不光是传说中的那种“女侠”的风貌。她既有中国传统的美德，又有一个特殊时代优秀女性的特征。在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她目睹了那么多的人在她的身边默默倒了下去，可是她还是走完了她的征程，也完成了她人生的追求。

陈联诗这个人物，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如今那个时代不可能再现，可是陈联诗和她的战友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德，却通过这部书永远留给了我们。

列宁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关于青年团的任务的讲演里谈到，对青年们，以他们父母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经历和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历史来进行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基础。相信作者写了三十多年、今天终于和读者们见面的这部书，对于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懂得过去，懂得先辈们艰苦斗争的历史，懂得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是会有帮助的，是大有裨益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日

序言

韦君宜

六十年代初，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朱叔和同志到四川出差，两次回来都对我说起四川省作协正在组织力量整理一部书稿。这部书稿是一位叫陈联诗的女同志留下来的自述回忆录，她从一个大家闺秀走上革命道路，亲身经历了四川华蓥山区我党领导的三次武装斗争，人称双枪老太婆；她的丈夫叫廖玉璧，是革命烈士，夫妇俩的经历都非常丰富，传奇性也很强。朱叔和同志再三提出要抓这部稿子。一九六二年夏秋，我到了成都，见到了书稿的整理者——陈联诗的女儿廖宁君和女婿林向北。我觉得书稿很有特色，决定由我社来抓，小说组组长王仰晨同志作责任编辑，书稿就由林向北执笔来写。我回到北京之后，见到了沙汀同志，和他也谈起过陈联诗同志的事迹，他是非常赞成的。以后王仰晨同志也多次到过成都，和廖宁君、林向北同志磋商书稿的有关事宜。

可是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接到好几封告状信，其中一封自称还是廖玉璧的同学，说廖玉璧上山是当的“土匪”，烈士是假的；还说华蓥山游击队根本不存在，后来江青也持这个观点。一时关于这部书稿和陈联诗同志的是是非非，闹得纷纷扬扬，事情就这么搁了下来。后来听说廖宁君同志因此忧愤成疾，不幸去世；沙汀同志在“文革”中也受到牵连。“文革”后期，沙汀同志来了北京，又和我谈起这件事情，茅盾先生也曾专门找我问过这部书稿，可是当时由于事情本身没弄清楚，不可能出版，只有等待机会。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文革”之后，四川的地方党组织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对陈联诗夫妇的革命斗争历史作了公正的评价，追认廖玉璧同志为烈士。最近又听说他们的外孙辈已将书稿整理成了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文学作品，并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推出，我的心里非常高兴。陈联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她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农大众一起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丈夫牺牲之后仍然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从不妥协低头，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读过之后，能够从中受到深深的人生启迪。

功垂青史光照后人——《“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黄友凡

我是一名长期在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早在三十年代末就认识了陈联诗同志，并和她的孩子们一样尊称她为“诗伯”。多年来，我和她及她的全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战斗友谊，也和许多熟悉她的老同志一样，一直关注着她留下来的五十多万字的口述回忆录。现在，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终于由她的后代写成传记文学出版了，我手捧书稿，反复阅读，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下来。

一九二六年，我党正是幼年时期，对于武装斗争还处于摸索阶段，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廖玉壁毅然接受了党组织的派遣；带着妻子陈联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川北华蓥山下的岳池县。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一揽当地的民团武装大权，和同志们一起抓住群众和中小地主痛恨反动军阀的心理，发动了以抗丁抗粮、地方自治为旗帜的“川北民军”起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极其险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二十多年游击战争，这在四川和全国都是罕见的。他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制定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牵制了反动军阀“围剿”红军

的大量兵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尖锐复杂的斗争将廖玉壁从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锻炼成我党杰出的模范先锋人物和当地群众爱戴的领袖，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他们紧紧依靠与群众血肉联系的这个法宝，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中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使华蓥山区这个毗邻重庆的战略要地，一直成为插在敌人心腹之地的一柄利剑。

我相信看完这本书的人们，也一定被陈联诗这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所征服。她在丈夫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总是抢着去完成那些既重要又危险的任务。她没有经历过战争，却一次又一次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胜利归来。她没做过生意，但为了游击队的生存，她开服装店，当船老板，办运输行，每次也是大有所获。敌人几次将她逮捕入狱，她都没有屈服，还在狱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和孩子，可为了革命却长期骨肉分离……尤为可贵的是当廖玉壁牺牲，游击队主力被打散、又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的情况下，她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毅然重上华蓥山清理整顿队伍，发誓要将丈夫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陈联诗的经历，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女性成长的足迹，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会使年轻一代了解我们党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了解当时四川的社会环境和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了解一批伟大的、崇高的人，并为我们的党培养出这样的人而自豪。

豆蔻年华

从西南重镇重庆，沿嘉陵江北上，经合川、武胜，就到了一个叫岳池的县。嘉陵江和渠河两条大河，分别从这个县的西边和东边流过，紧邻着的便是盆地东部突然隆起的华蓥山脉。这个县的平坝和浅丘地区，盛产稻谷，早年的“ 黄龙米 ”，曾被朝廷列为专供皇帝老儿吃的贡米，一直是本地人的骄傲。因为粮食丰足，自然也出肥猪和鸡鸭禽蛋之类的副业。勤快的人家再养些桑蚕，编些竹席草席，日子也还算过得去。东南和邻县广安连界的华蓥山上，林木丰茂，庙宇嵯峨，山上不但出各种名贵药材，还产煤炭和石灰。这些农副土产，大都经过渠河运到两百多里之外的重庆，再经重庆运往长江沿岸的各省大小城市，若是顺了春夏天的水势，从渠河岸边的两个小镇罗渡溪和黎梓卫出发，到重庆不过两天的路程。

过岳池再往东去，翻过华蓥山，便是连绵不断土地贫瘠的高岭低谷，一直连着大巴山区，于是当年也算是川北的一等县的岳池，便很有些惹人眼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 银岳池 ”的美称。

因为富足并且不偏僻，这里也出人材。一旦有了国门开放的机会，大大小小的士绅子弟们便不只是在书房里读那些八股文章，也经重庆，出夔门，到汉口、南京、上海、北京乃至东洋日本留学深造。回来之后，也有就在外地做官，尔后衣锦还乡买田置地光宗耀祖的；也有故土难离，立志服务桑梓，发誓在家乡建一番功业的；当然也有仕途不顺，便学陶公挂冠归隐，闲居乡里的……这种风气代代相传，到了本世纪初，越是兴盛起来。

早年县城里出过一些大人物，别的可以省略不说，而康家吊楼子却是城里妇孺皆知的。

这是一座很有点气派的大宅子。在这里，出过清朝的翰林大学士，还放过外省的主考，为此城里专门修了一座翰林院，以纪念这位为家乡父老争了光彩的人物，康家也因此成了在地方上很说得起话的名门世家。可是渐渐地，这个家庭便不大景气，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主持家政的康老先生，到老来也只挣了个候补秀才的名分，两个儿子却连这点功名也没有，就废除了科举。眼下家中虽然还硬撑着书香门第的气派，却是明显地中落了。

家境不顺畅，心境也就不好，到了临终之时，老人眼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女子孙们，还免不了为他们担心。两个儿子虽说没有功名，却好歹还有些祖上留下的家产，最令老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那个女儿。想当初，自己为这个掌上明珠找了个好婆家：公公陈尚之是渠河边赛龙场的陈家坝子上有名的大绅粮；女婿心地宽厚，脾气也好；家中开了个药铺，自己行医号脉，日子也还过得去。加上陈家九弟兄，是个望族，读书的多，做官的也多，人家都说自己把女儿送进了福窝窝里。可是天负人愿，没想到陈尚之自己不争气，很快就把偌大一份家产败得精光，不久前连女婿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弱女子拖着四个孩子，全靠为人做些针织活儿，日子也实在过得艰难。

想到这些，老人长叹一声，吩咐大儿子把家里的衣服杂物收拾一些，让女儿带回去。

没想到旁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我们不要。”老人有些意外：“为啥不要？”

那小姑娘抬头看看母亲，朗声说道：“我妈说的，人穷要穷得硬气，饿要饿得新鲜，要了人家的东西，就会让人家看不起。”

老人昏花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床沿，连声说：“好、好、好！人穷志不穷，将来一定有出息，把她送进城来，让她读书！”

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我是一九〇〇年出生的，那时候只有七八岁。

外祖父去世之后，母亲死死记住了他的话，把两个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家中拖着得了痨病的大哥，还是千方百计凑了些钱，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大舅的照拂下上了学。大舅是个厚道人，他和二舅有大大小小的四个女儿，年岁都和我差不多。我体谅母亲的苦心，学习很是努力，成绩好，可是一想到自己家里穷，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外婆心疼我妈妈，对我格外宠爱，常对人说别看我这外孙女儿命不好，可是自小聪明，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是又兴个什么新科，我家玉屏，说不定就会中了个女状元呢。

可是外婆宠坏了我，以至我一到外婆家，就“聚众造反”，把这个从来都规矩森严的大家庭搅得一切都乱了套。

此时，虽然张澜先生①已从日本回来，在毗邻岳池的顺庆（今南充）开了“天足会”，力倡扫荡陋习，但岳池城里仍然是男女七岁不能同席，女子上十岁出门就得坐有门帘的车轿，缠足之风依然盛行。我进外婆家，都快十岁了，还是一双天足。老人家一看就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女儿家哪能没有规矩，将来人家还说是她外公不在了，我没有教好。说着就让舅妈用长长的布条子给我缠足，完了还用针线缝上，任我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不理我。我自小任性，在家里都是不受人管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一气之下，就悄悄找来一把剪刀，白天强行缠上了，晚上我就拆开缝得密密麻麻的针线，把

裹脚布剪成碎片。一连这样干了两次，舅妈没办法了，和外婆默默相对，在堂屋里坐了半天，最后外婆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这下子我可得意了，在几个表姐妹中间一鼓动，被缠足害苦了的姐妹们，都闹着把脚放了。从此之后，几个表姐妹成天跟着我一起进进出出，俨然把我当成了“首领”。到后来，我们上学连轿子也不坐了，甚至嘻嘻哈哈结伴逛街进馆子，还去后山看男中的学生打篮球。

本来康家的姑娘们，就长得一个赛过一个的，又是书香世家的女子，从前出门都是车子来轿子往的，世人们只有所闻，未见其人。这下子一露面，而且个个都成了不服管教的“野马”，自然引得舆论大哗，常常我们一上街，后面就会跟了一大群。大舅是个厚道人，外公不在了，外婆又管不住，他自然也拿我们没办法，在外面听了什么闲话回来，只有叹气。我们几个一合计，觉得这是那些人拿我们没办法，就去欺侮大舅这样的老实人，得收拾收拾他们才行。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一个老表看见我们在街上走，引得遗老们指指点点，就跑到家里来对大舅和二舅说：“大叔二叔，你们还是把几个女娃子管一下嘛。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能同席，这些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真就不要了么？你们这样人家的女儿，满街抛头露面的，像什么话哟！”

我一听这话，心想正找不到是哪个在作怪呢，原来是你这个假正经，连忙把几个表姐妹都喊上，跑到他家大门口指名道姓地把他喊出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吵大闹：“我们在街上走，关你什么事？”

“你守规矩？你咋不把清朝的袍子穿出来呢？表嫂出门咋不拿块布把脸遮起来呢？”

“男女授受不亲？你那天咋跟一个女的亲亲热热、又接又送的？”

“男女授受不亲？你屋里也有女人嘛，你咋就要喊些男的到屋里来呀？”

“你和表嫂……”

表嫂在屋里听到了，气得眼泪花花的，出来委委屈屈地说：“你们说他，莫要牵扯我嘛，我又没惹你们。”

这个老表，没想到堂堂正正一个大男人，却让几个小姑娘堵在自己的大门口当场揭短，看着门外围着的那么多人，气得脸色发青，语无伦次的，突然蹲在地上，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闻讯赶来的大舅在旁边，急得不知咋办才好，我们却得意洋洋，乘胜而归。

后来，有好心的人对我大舅说，别看你家那陈三姑娘，才呀貌的在这几个女儿中间数得上人尖子，可是心气太高，生成了个男儿的命，将来是要吃苦的。

就这样，我一边带领姐妹们胡闹，一边又以优秀的成绩一年读完了初小，又一年半读完了高小，接着进了岳池女师读书。那时，早有张澜先生在顺庆开办端明女学的先例，而后建立的岳池女师作为“男女平等”的榜样，为渴望自由的闺秀们开出了一方天地，在川北地区还是有些名气的。在女师读书的那几年里，除了康家姐妹外，我还和一位叫陈德贤的女同学十分要好，每到假期，都要到她家里去住上一段时间。

德贤的父亲叫陈怀南，算起来和我父亲还是同堂隔房的兄弟，我叫他二伯，家中也是几百千把挑谷子的大户，自己还到日本留过学。他治学严谨，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物，在岳池教育界很有声望，还是县里的议员。在老辈子面前，我说话行事不敢造次，加上人慢慢长大了，性格中也添了些许矜持，

居然被夸为“温文尔雅，聪慧好学”，讨得了二伯和二伯母的喜欢。

二伯嗜好书画，家中藏有《芥子园画传》，闲时也爱涂上几笔，还教我们几个姐妹配诗作画。在这方面，二伯对我尤其看重，说我的悟性好，只要持之以恒，将来一定会学有所成，使我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我这个人，连画画也和当时的大多数闺阁女子不一样，虽然习的也是晚清时期盛行的文人工笔画，可是我不仅仅画花鸟虫鱼，还画人物；而且画的人物也不仅仅是那些古装仕女，还爱画《三国》、《水浒》插页上的“天罡地熬”们。

我喜欢张飞，也喜欢关羽，还喜欢《水浒》里鲜鲜活活的一百单八将。我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将这些人物全部临摹下来，装订成册，在班上流传，而且很是得意。

我画画用的颜料，也与别人不同。工笔画又被人称为“功夫画”，哪怕是黄牛身上的毛，也得细心地一根一根地去描，还得描出每一部分毛色深浅不同的层次来，这就得静下心来，半点也浮躁不得。如此花费工夫画成的画，要想留它个天长地久，就得寻找那些既不容易退色又有特色的颜料。比如说胭脂花的种子，将那层黑壳剥去，里面的那一包细滑粉末就是极好的白色颜料；将一种中药点燃，让那黑烟熏在一只细瓷碗的碗底，那凝在上面的烟灰就是极好的黑色；那些长满了苔藓的石头，用一般的颜色是调不出来的，只有去山涧里找一种青色的石头来磨，画出来既真实又不退色；墨也要好的，若是一时买不到好的，就自己来炼，炼出来的墨又黑又亮，还有一种奇特的香味。这其中的奥妙，这些年来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总想打听，而我不过一笑置之，从来也没有告诉过谁。

转眼之间，我从女师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教授国文、自然和美术。那一年，正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冲击着小小的岳池县城，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县议员们都分成了两派，常在茶馆里展开辩论。二伯既有旧学根底，又不排斥新学，每逢星期一，照例在家里开堂讲学。全县教育界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连同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和两个儿子都要来听课。我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可是这位老先生对于女孩子，尤其是对我要在这广庭大众中露面，总还是有些犹豫。到后来，总算是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我和德贤躲到门帘后面去，他管这叫“垂帘听课”。我高高兴兴地和德贤一起往她家走，谁知刚到大门口，就碰见了她大哥陈远光和另外两个男孩子。远光大哥一见我就站住了，故意大惊小怪地说：“哟，陈玉屏，岳池县的大美人儿，怎么肯上我们家来了？”说着他们就嘻嘻哈哈地跑进了大门。只有一个大个子不笑，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自己的脸却先红了。

我自来不把男孩子们当回事，怎么肯让他们来讥笑我，正要发作，却被德贤一把拉住，问我认不认识那个大个子。我赌气说认不得，德贤一听，笑着说：“你怎么连他都认不得啊？他是我大哥的同窗好友，叫廖玉璧，外号廖大汉，成绩是学校最好的，还会吹箫、打篮球，你还难为过人家呢！”

德贤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年的端阳节，我和姐妹们一起到翰林院去踢毽子玩，一群男孩子在后面跟着起哄，被我们一阵乱骂之后，所有的男孩子都一哄而散了，只有他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正想这人的脸皮还真厚呢，他却拿出了一根黄瓜，说对不起，这是你们刚才跑掉了的，还你。这一下，刚才还尖酸刻薄的姑娘们，一个个都窘住了，最后还是我把手一挥，说：“我们不要了，送给你自己吃吧！”反而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男中（即县立中学）的篮球队长，再后来，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专门去看过他打球。我不再说什么，和德贤一起进了屋，躲进了帘子后面。其实，小小的门帘，哪能挡得住姑娘们的好奇心，我和德贤掀开门帘的一角，对堂上的人物评头论足，那个被德贤称为“廖大汉”的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别看他腼腼腆腆的，在姑娘面前只会脸红，一旦起身言论，却语惊四座，不是“内附权贵，外结强邻”，就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血心肠，真令人为他的大胆捏一把汗。除了听课之外，我们每周还要做两篇文章，交二伯批改，于是我想方设法，将廖玉璧的文章借来一读。当时男中的新潮空气很浓，学校公开订有《新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提倡白话诗，还开演讲会。每当杂志上有了什么好文章、新观点，远光大哥、廖玉璧和几个要好的同学都要到陈家来争论一番。一向心高气傲的我，在一旁听得如痴如醉，对于他们几位，尤其是对比我还小两岁的廖玉璧佩服已极，每每看罢他的文章，或者听了他与人的争论，我都要激动很久，甚至彻夜难眠。渐渐地，我往陈家的走动更勤了，总是希望能在那里看到玉璧，而且几乎每次都能如愿，我相信他也是极愿意见到我的。

终于有一次，远光大哥悄悄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竟是玉璧写的，他要求和我“见面”，把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他所说的“见面”，其实就是“五四”时期在进步青年中很流行的“约会”。在这川北小城中，男女一无媒妁之言，二无父母之命，就私自“约会”，若是传了出去，那可不得了！

慌忙无计，我去找德贤商量，谁知一向拘谨的德贤却诡秘地一笑，说约会就约会嘛，有什么了不得的。我说：“你这个死女子，咋敢这样说话，要是传出去了，那可咋办！”德贤一听，说：“你这个人，平时那么激进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打退堂鼓了？你不是喜欢他吗？莫要错过了机会哟。”我还要说什么，德贤却一摊手，说：“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事，是我大哥和他一起商量的。”

几天之后，二伯讲完课，到茶馆去了。远光大哥等人们都散了，连忙关了大门。德贤把我拉进了她的闺房，那个“憨大胆”正脸红筋涨地坐在那里等着呢。

德贤兄妹哈哈一笑，就要走，我连忙拉住，说你们走啥子嘛，又不是认不得的人。于是他们就陪着，东拉西扯地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趁二伯还没回来，连忙散了。这件事就这么开了头。以后玉璧常常买通他们学校的勤杂工给我送信，我也常常明里暗里和他见面，听他讲《新青年》，讲孙中山，讲个性解放……那时候我暗暗奇怪，这个一向被认为沉稳内向的人，发起议论来却如此滔滔不绝，从前真是错看了他。

我和玉璧自由恋爱的事情渐渐传开了，街头巷尾有了传闻，别人我们倒不在乎，二伯那一关是非过不可的。这事首先由远光大哥去给老人家做工作。二伯听了，很犹豫，觉得我虽然家道中落，但毕竟祖父是有过殷实家产的大粮户，父亲本人还做过当地的议员。再说我在外婆的书香门第中长大，人品才貌不仅在康家的姐妹中间，就是在岳池城里也是屈指可数的，也算得上名门闺秀了。当时周围几个县里都有人来说亲，一个个都是有田产有地位的士绅子弟，有的还在北京、南京读书甚至做官。而玉璧的家，住在离县城百余里的黎梓卫太阳坪村。他的父亲早亡，小时候家里很穷，给大地主张玉如家放过牛，后来祖父和叔叔做生姜生意赚了笔钱，回来办起了纸坊，才有钱送他进城读书他家不过是个才发起来的小粮绅，不仅家境和我相去甚远，

本人也没有功名，怎么说也配不上。

远光大哥说了半天，很为难。我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马。我说：“二伯，你是因为我是陈家的姑娘，过于偏向我。若论家庭门第，玉璧家里确实比不过，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后来我家里穷成那样，比起玉璧的小康之家就差远了。我现在能够不受人欺侮，不过是因为外婆家的厚爱。再说，最贵重的是人，拿人和人相比，玉璧胸怀大志，比起那些公子哥儿、纨绔子弟，要有出息得多。”

那年月，我虽然激进，可是一个大姑娘自己出面来说这样的事情，也实在是不得已。二伯虽然注重门第，却不嫌贫爱富，对玉璧这样品学皆优、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本来就很器重，再加上听了我和陈家兄妹的这些话，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看我是铁了心，也就不再反对，听之任之了。

一九二〇年，玉璧从男中毕业，到成都高师附中继续求学，我们便自行订婚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了茶楼酒肆中的特大新闻，说我这样大户人家的女儿竟然不要媒人聘礼，自己就同一个放牛娃儿把婚事订了，实在是不成体统。我不听这些闲言碎语，只管和玉璧通信。玉璧就读的成都高师，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当时由王右木①任学监，教日文；张秀熟②是国文老师，后来吴玉章③担任了该校校长，恽代英④也来任过教，还有任正格等一批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玉璧一进高师，就和德贤的哥哥陈远光等人一起，加入了学生会，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接着还参加了王右木亲自创立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Ｃ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震惊一时的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我不断收到玉璧寄来的书报杂志，其中有《新青年》、《小说月报》和鲁迅的书。这些书刊很快引起了不少老师的注意，每逢玉璧一有信来，大家就要争着“排队”。可是有一次，正争着抢着，突然都不开腔了，然后一个个悄悄地走开。我觉得奇怪，回头一看，才知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刘灼山来了。

２１双枪老太婆

①

②

③

④恽代英：江苏省武进人，中共早期著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曾在四川工作，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一年在南京牺牲。

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学家。早年为救国图强留学日本，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论员，回国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为筹划著名的四川顺（庆）泸（州）起义而积极准备，一九六六年去世。张秀熟，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教育厅厅长，一九九四年去世。

王右木：四川江油人，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去世。

这个刘灼山，早年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可是德行却极不好，在学校一贯专横跋扈，搞奴化教育，还毒打学生，大家对他都恨之入骨。他拄着黑拐

棍走到我面前说：“ 陈玉屏，今天下午你的那班学生不要上课了，给我老爹做些纸人纸马，清明节快到了，我要去扫墓。”

我瞪了他一眼，说：“ 我是来教书的，又不是来给哪个做纸人纸马的。”

他也把眼一瞪说：“ 做纸人纸马又怎么了？就委屈你陈玉屏了吗？教员是我请的，就得服我管。”

我一听，就冒火：“ 什么？教员是你请的？要服你管？那好，我不干了！”说完一转身回到教室，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对学生抖落出来，然后一昂头，出了学校。

那时候一个姑娘家，得张聘书不容易，我一气之下退了聘，硬着头皮回到大舅家，把事情给他讲了。一向厚道的大舅，也气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说：“ 退得好，退得好。

人活就要活得有志气，此人如此不讲道理，要跟他理论理论。”

我想了一夜，也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刘灼山，第二天就回到学校，找到几位平素要好的同事商量，决定打他的“ 代邮快电 ”，拿时兴的话说就是发传单。我们拟出了刘灼山的十大罪状，记得其中有几条是搞奴化教育，打骂学生，贪污公款，全家人在学校吃饭不给钱；还有吸食鸦片，在学校给军阀选姨太太，强迫教员和学生做纸人纸马等等，不堪为人师表，更不堪为一校之长。这份代邮快电到处张贴，整个岳池都炸开了。女师的师生们本来就恨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全校都罢了课，“ 打倒刘灼山 ”、“ 刘灼山一日不出学校，学生就一日不上课 ”的口号喊得天响。刘灼山眼看收不了场，就去把县长和教育局长搬来，才把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可是他的女师校长当不成了，只得卷起铺盖卷儿一走了之。

校长被我们赶走了，可是我也教不成书了，幸好玉璧也从高师毕业回来，我们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举行了婚礼。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陈家三姑娘，从县城里那座深宅大院里，嫁到了渠河边黎梓卫镇的太阳坪，嫁到了这个离华蓥山不过五六十里的小村庄。玉璧的妈妈和所有的人，都拿我当成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小心又小心地捧着我，护着我。可是这里的一切，和我以前的生活差得太远太远，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于是偌大的一个院子，就显得太安静，太闲适，闲得我真有些受不了。我常到黎梓卫街上去走走，看绿树掩映下小镇的粉墙青瓦，看渠河的水清悠悠慢悠悠地流，看水码头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装满这四乡八场的土产山货，只听得船老板一声吆喝，它们就沿着这条清清的渠河，下重庆，去武汉，到上海……

难道我这辈子就死守在这小山村里？难道我连这些土产山货都不如？难道我就不能走出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容得下我的世界？

于是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掉了分在自己名下的部分田土，然后和远光大哥、玉洁表姐，还有玉璧的好友岳刚一起，到南京去读书。

我们从黎梓卫码头上船，先到合川的石龙场，然后翻山沿小路到重庆，这样就能避开当时军阀们在沿路设下的许多关卡，省了好多麻烦。我和玉洁长了这么大，却是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小船上看什么都稀奇，正叽叽喳喳地高兴得不得了，一回头却看见玉璧沉着脸一声不响。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群纤夫，光着脊梁在铺满卵石的河滩上一步步地爬行，他们的头几乎点着了地，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号子声。我一下子觉得山也不青了，水也不绿了，偎着玉璧轻声地说：“ 他们……真苦。”

玉璧长叹了一声，说：“ 是啊，现在好多地方，水上都开始行汽划子机

轮船了，我们这渠河上，还靠着他们拉纤。”

我说：“为什么？是船老板们不愿用汽划子吗？”玉璧看着那些纤夫，说：“怎么会不愿意，可是那都是科学，是革新，需要有人来提倡，来扶持，来为它而奔走呼唤。如今川内军阀们各据一方，忙的是派粮派款，巧取豪夺，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谁还有心来做这些啊！这样下去，我们四川，我们中国，怎么富强得起来，怎么会不受外国人的欺侮！”

我的全部兴致，一下子被这些在江河上拉了千百年的纤夫们，打消得干干净净的。

到了重庆，我们在离千厮门不远的汇元客栈住了下来。一放下东西，我和玉洁就忙着要上街去看稀奇，可是却被玉璧他们拦住了。我坐在旅馆里等着船票，心里闷得慌，咕噜着说：“岳池城里那么封建的地方，我都不怕，怎么到了这样文明的大城市还上不了街了？”玉璧却说：“你呀，就是简单，以为这大城市就比乡下好了？”

这天晚上，我和玉洁突然被隔壁间一个女孩子的惨叫惊醒，连忙翻身下床，披上衣服就要去看出了什么事情，谁知一打开门就被玉璧堵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军阀奸污了一个小姑娘。客栈里洗衣服的大嫂只是摇头，说：“这些事情，多啊，多得很，不稀奇。重庆这地方，就这么糟。”

我完全没想到这个自己向往很久了的大城市，会是这个样子，心里真是有些害怕，成天脚跟脚地跟着玉璧，一步也不敢离开，就这样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船票。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收拾着起身要上船，玉璧却突然说：“我不坐这趟船了，你们和远光大哥先走，我要到成都去会一个朋友，然后再来南京。”

我一听心里就不高兴：“什么不得了的朋友，比我还要紧？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就放心我一个人走？你那朋友的事情，给他写封信去不成吗？”

一向让着我的玉璧，这次却只是温柔地笑笑，一边继续收拾他的东西，一边说：“那咋行？我跟人家约好了的，总不能不守信用嘛！再说也去不了几天，很快就会赶上你们的。”说着悄悄地吻了我一下，真的就一个人走了。

我在大舅家，历来都是大家听我的，没想到结婚才几天，玉璧就这样对我，气得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哭不出来。人，是我顶着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自己选定的，一结婚就吵架，岂不是让人家看笑话？

我看着他的背影，咬咬牙，只好和玉洁表姐他们一起起身了。到了宜昌，我们在旅馆里等着换船，忽然听见楼下闹哄哄的，就跑出来扶着栏杆看热闹。只见楼下站着一群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其中一个在哭，另一个气势汹汹地挥着鞭子要打她，其余的人拉着那个在哭的女人，拿着几朵珠花劝她戴上，旁边围着一群歪戴帽儿斜穿衣的烂丘八。我们正在奇怪，不料其中的一个兵猛一抬头，突然指着我们大声喊道：“嘿，这上面还有两个好的！”说着便一窝蜂挤上来一二十个，七手八脚就要拉我们下去。

我和玉洁吓坏了，一边挣脱一边大声喊救命。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远光大哥和岳刚听见喊声，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来，冲进那些烂兵堆里就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老板带着两个伙计也赶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半是推拉半是劝的，才把我们救了出来。老板松了口气，看着惊魂未定的我和玉洁说：“你们这样的年轻女子，怎么敢出来到处露面？这些烂兵，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加委屈，要是玉璧在我身边，我怎么会受这样的

欺侮。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玉璧在高师读书时就已经参加了ＣＹ（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次丢下新婚燕尔的我，也实在是不得已，他是去成都转组织关系的。

一个黄昏，船驶进了下关码头，南京终于到了。看着江面上那些飘飘扬扬的外国旗，想着一路上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的心头沉重得很，只是觉得这个乱糟糟的社会，真是该改造。可是怎么改造，由谁来改造，我却不知道。古书上有过“移风易俗，君子之德为风”的说法，我真希望什么时候出来个圣人，一夜之间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不管怎么说吧，南京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块绿洲，我期望一切都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们到南京快一个月了，玉璧和他的两个朋友才到，大家投入全部精力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每天早晨四点半钟，我们就到东南大学农场里去读书。这个农场在东南大学后门的北极阁，树林茂密，青草绿茵，一条小溪向东流去，溪上一座小桥，桥下的荷花开得很好，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来这里读书的人很多，我和玉璧认识了黄明、何超腾、何幻生等一批好朋友，这年秋天，我们几个一起，都进了南京东南大学。虽然很多人劝我学美术，我自己还是想教书，就考入了教育系；黄明在文学系，超腾在政治经济系，远光和玉洁表姐则转到上海考美专和文科去了。只有玉璧不知道发什么疯，那么好的成绩，却去考了体育系，说是中国人身体太差，学体育把身体练好了，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进了大学，学习更紧张了。我和玉璧白天各上各的课，晚上要做功课，余下的时间玉璧他们还常关在黄明和超腾房间里开会，忙得连夫妻俩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黄明是学校共青团的书记，只知道他家里很穷，没钱供他读书，他自己办了个刊物叫做《学诗》，就靠这个刊物卖点钱来维持生活。黄明这个人，平时对人热情谦和，可一旦争论起什么问题来，却是水清见底，不由得你不佩服。见他常和玉璧、超腾一起开会争论，我也想听听，但每次他们都把门拴上。

有次不知咋的，一推门就开了，我便走了进去，他们一下子慌了，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书呀本子的。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们在开什么会，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的，支支吾吾说是在开读书会。我一听很高兴：“读书会呀？我也来参加一个吧！”说着就坐了下来。他们口里说欢迎欢迎，可是接下来一个个都不开腔。我哑坐了一阵，玉璧不高兴了，瞪了我一眼：“你今天不做饭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出去，心里却窝火得要命。看来他们是有事情瞒着我，可是我哪一点又不值得他们信任呢？他们是学校里的进步分子，难道我就不进步吗？我和你廖玉璧自由恋爱，和刘灼山作斗争，这些都不算进步？做饭做饭，你廖玉璧和我结婚，就想找个做饭的？！

寒假，玉璧接到岳池县邮政局长熊尧莫①的信，回了一趟家，正月间还没回来，一封上海的邮件又到了。我想一定是玉洁表姐和远光大哥来的，就把信拆开，谁知里面是两本《向导》杂志，还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简文兄，上次委托之事，不知办妥否……老肖大哥问你好”，剩下的文字，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我心里更奇怪了。这廖简文，是玉璧在家乡的小名，在这里是没人知道的，何况这人的签名我也不认识，还有什么老肖大

哥。

没两天，玉璧回来了，我把信交给他，还没说话呢，他就火冒三丈：“你为什么要拆我的信？”

我莫名其妙地说：“信有什么拆不得？又不要你的。”“你今后不要拆了。”

我想起他平时对我东躲西藏的样子，一赌气说：“我偏要拆，拆了又怎样？”

“拆信不道德，你不知道吗？”

“嗬，这就算不道德了？那天下不道德的事情多得很呢！我问你，这信是谁写给你的？老肖大哥又是哪个？你成天什么事情都瞒着我，还说我不道德，我怎么不道德了？！”

这是我们结婚后，玉璧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而且仅仅是因为拆了一封信。我委屈极了，气得哭了一场。半夜里，玉璧把我摇醒了，好言好语劝了半天，最后说：“今后除了家信之外，朋友来的信你不要拆。这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又不知道轻重，万一说漏了嘴，泄露出去了不好……”

说了半天，还是不让我知道他的事情。我翻身坐起来，瞪着他说：“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组织？”

玉璧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不说，我也不追问你，如果真有这事，我要参加。”

玉璧听了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一点，不该问的事情，你不要问；到时候条件够了，我们大家会通知你的。”

说了半天，是嫌我条件不够！我气得眼泪花花的，钻进被窝里不理他了。

玉璧没办法，用指头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二五年初，我在医院里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宁君，小名江宁。有了孩子，又要读书，由于产后没休息好，我身体不大好，虽然请了保姆，还是觉得应付不过来。多希望玉璧帮我一把，可是他更忙了，常常是半夜三更不回家。不久，上海的日本人枪杀了纱厂工人顾正红，传单很快发到了南京，学校好几天没上课。紧接着，上海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又遭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在全国激起反帝高潮。六月三日，南京东南大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玉璧、黄明和何超腾都是学联的重要人物，成天忙着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给罢工的工人募捐。我把才三个月的宁儿交给保姆，揣上几个烧饼，也参加了游行募娟的队伍，和何超腾、何幻生他们编在一个组。南京街头，愤怒的人流从一条街涌向另一条街，口号声惊天动地，不断有商人、工人和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街口，我们的同学就要站上长凳去演讲。群众涌进大大小小的商店，把里面的洋货统统拖出来，当众烧掉，整个南京城到处烟雾腾腾，火光冲天。

九日早晨，玉璧很早就起身了，要和超腾、幻生、黄明他们到下关合记洋行开办的工厂里去，那里被日本人看得特别紧，直到现在还没罢工。玉璧叫我这天别去募捐了，中午准备六七个人的午饭。当时街上什么也买不到，我把存着的腊肉和豌豆、海带煮了一大锅，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他们几个才回来，都兴奋得不得了。

我见他们满头大汗，连忙倒茶倒洗脸水，这时才发现两个陌生人。一

位穿着海苍蓝的洋布长衫，另一位外穿半新旧的毛蓝土布长衫和长裤，里面穿着白土布汗衫，长着麻子的脸上满是汗水珠子。玉璧叫他把衣衫脱了凉快凉快，他直说不热不用脱。幻生说：“你真不愧是个‘处女’，脱了长衫怕人家笑话吗？”他看看我说：“我怕密司陈说我没礼貌。”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黄明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呢，你就开起玩笑来了。”我这才知道那位不肯脱长衫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萧楚女①，刚从四川来。我在家乡读过他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文章，玉璧对他也是很推崇的，没想到今天竟成了我家的客人。

刚刚才三个月的宁儿，看见屋里这么热闹，也手舞足蹈地在摇床里咯咯地笑。萧楚女走到摇床边把她抱起来，和几位客人嗬嗬地逗着，一边对我说：“密司陈，老廖他们挺厉害啊！我和老刘从上海赶来，还准备帮着组织一些大的行动呢，没想到他们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对萧楚女很钦佩，觉得他既风趣又有才华，还是玉璧他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说不定那封神秘的信里的那位“老肖大哥”，就是指的他。可是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很快地就回上海了。

萧楚女他们走了之后，形势很快就紧张起来，学联的成员很多被指名通缉，也有同学失踪，出去就没见回来。眼看风声一天天紧了，玉璧要我着手准备，随时都可能转移。一天，我到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催促家里寄点钱来，柜台里照例递出一张挂号单，我也照例在上面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出门的时候，一个军官盯了我两眼，我也没在意，径直回了家，然后换了件衣服，准备去学校。

刚刚走出大门，一辆汽车就在外面刹住了，一个兵从车上跳下来，对我说：“请陈玉屏小姐上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反问他：“你找谁？”

“找陈玉屏。”

看样子这个兵还不认识我，我往巷子深处一指：“陈玉屏没住这儿，在那边。”

那个兵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们料定他两口子住在这里。”

我赶紧抱出宁儿，七弯八拐穿小巷到了学校。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又来了，可我们已经人去屋空。

这以后，我们连续搬了两次家，都不安全。眼看南京是不能呆了，玉璧说：“组织上让我们先把孩子送回家，然后转移到上海去。”

我问是不是“老肖”的意思，玉璧点点头。

不久，我们回川了。这时，何幻生已经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黄明也准备走，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大约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吧，玉璧在合川县遇见何超腾，才知道幻生已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听说是被“腰斩”的，死得很惨。超腾还告诉玉璧说，几乎在幻生牺牲的同时，萧楚女也在广州被杀害了。超腾自己，后来在万县死于刽子手王芳舟①的屠刀下。

我们在南京的几个好朋友，都这样壮烈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耕耘播火

八月初，我们离开了南京。

天刚亮，黄明和其他几个同学赶来送行，一起到了下关码头。码头边一大群人围着一男一女两个英国佬，守着一大堆行李发愁。平常这点行李，两毛钱就可以搬上船，可是今天出了五块钱也没有人给他们搬。一个工人抄着手说：“在咱们这群人里啊，你出五百元也买不出个卖国贼。还是去找吴佩孚吧，别说是这两件行李了，就是叫他的那些警察给你们舔屁股，也是没得二话说的！”

两个洋人没办法，只好弯腰合抱起一只大皮箱，很吃力地向囤船走去。女的穿的高跟鞋，踩到刚落过雨的跳板上，脚下一滑，差点摔进水里。岸上的人看了，都拍着手哈哈大笑。

我们上了囤船，看见苍蝇蛆虫爬得满地都是，腥臭味熏得人直是想呕。一打听，原来是英国太古公司的鸡蛋，打算运到上海，可是码头工人不准搬上船，就在这囤船上放了两个月。南京天气这么热，鸡蛋生了蛆，一些人见了直说可惜，我却说了声活该坏了这些臭鸡蛋，也叫洋鬼子晓得咱们中国人是不好惹的。

汽笛拉响了，旅客与送行的人互相道别，码头上一阵呼喊，黄明拿着一张手帕，不断地在空中挥舞。轮船破开浊浪，在江面上行进，风渐渐大了。我把宁儿抱进舱里，哄着她喝了牛奶，又拍着她乖乖地睡着了。待我走出舱来，玉璧还站在船头，一动也不动。

我递了块饼干给他：“呆了？想什么呢？”

“我在想一句话，一句从前我最不愿听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我说：“你今天怎么自卑自弃起来？孙中山先生说，要唤醒民众，没有我们书生，民众怎唤得醒？”

玉璧说：“你又在宣传你的教育救国了。”

我说：“是啊，我的教育救国没有用。中国人体弱多病，挡不住丘八警察们的枪棍，要是个个身强力壮，打不赢也跑得快，看来你的体育救国才有道理！”

玉璧笑笑说：“都没用，我们都没有用。除非手头有了枪，枪杆子才有用。”

一说起枪，我就想起军阀的烂兵和警察，我不喜欢那黑洞洞冷冰冰的东西。望着水天交融的远方，我的心还留在南京，留在中山陵，留在玄武湖，留在东南大学农场的小桥边。此刻，桥下的荷花开得正是时候，那清香越过烟波浩淼的江面，一直飘进了我的心里。

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从此我再也没能回到南京，生活为我铺开了另外一条路。

一个黄昏，轮船驶进了朝天门码头——重庆到了。刚靠拢囤船，一群力夫就涌上来，挤进我们的房间抢着要搬行李。我紧紧地抱着孩子，玉璧忙去招呼，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廖大哥。我抬头一看，原来竟是夏林。他头上包一条蓝布帕子，身穿一件没有袖子的麻布汗衫，腰间拴根棕绳子，脚上穿双草鞋。玉璧一把拉住他：“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夏林推开一个力夫，伸手抓住我们的皮箱和铺盖卷：“嗨，一言难尽。走，上岸去再说。”

夏林和玉璧是偏毛根儿朋友，同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小时候一起放牛割草，后来又一起读了几年私塾，像亲兄弟一样。玉璧在南京时常叨念他，今天竟意外会面了，自然是很高兴。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豆花馆子坐下，玉璧破例地要了一瓶酒。

一阵寒暄之后，夏林叹口气说：“大哥大嫂你们走了两年了，不晓得现在的世道有好乱，捐啊税的多得吓死人，连那些军阀烂兵揩屁股的草纸钱也要我们出。原来来收钱的是保甲长，本乡本土的，说点好话塞几个鸡蛋说不定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干脆派个兵把你跟着，还要你管吃管住管草鞋钱。你们晓得我老爹不在了，我老娘靠帮人把我们拉扯大。前些时候我在广安新街帮我的寡妇幺婶跑腿，她老人家喜欢我，要收我做儿子，继承她那点家产。哪晓得夏家祠堂的族长夏三公想占她的家产，就暗地串通人要整我，害得我跑了回来。现在我屋头，糊三张嘴都不得了，哪里还有钱来交捐呀款的。狗东西的王尧！大哥你晓得的，现时是阳合场的团总，又是资马十二场的民兵大队长，他站出来说话了。说老太婆你没得钱，你屋头两个大成人的儿女就不是钱吗？要么你那姑娘跟我做小，你就是我的丈母娘，我王尧一天有吃的你也有吃的；要么你那儿子就去当兵，还可以卖几个钱，等二天当官发财回来讨婆娘，免得遭土匪拉了去，落个人财两空。”夏林接着说：“我老娘听了吓得发抖，一趟子跑了回来，当天晚上就打发我们姐弟两个跑了。我把姐姐送到合川姑妈家，求她看在我死去的老爹份上，给我姐找个厚道点的婆家，我自己就到了重庆，凭着力气挣碗饭吃。”

玉璧听了，好久不开腔，最后说：“不要紧的，你跟我们一道回去，以后自有报仇的机会。”说着他付了饭钱，我们一起到千厮门找了个旅馆住下。

孩子受热，整夜没睡。第二天我们同夏林起了个早，由千厮门码头坐汽划子到合川，然后找了个力夫挑行李，我抱着孩子坐滑竿，走旱路。玉璧腿长，和夏林说说笑笑的，总是走在我们前面，到太平场口，两个人跑得影子都见不到了。场口的栅门边守着两个兵，看见滑竿就喊检查。我说学生回家，有什么好检查的。一个兵眼睛一瞪，说学生是专门捣乱的，回来也要捣乱，更要检查。说着三下五下把我的行李打开，一阵乱翻，我抱着宁儿站在旁边，气得不得了。

挑夫默默为我收拾好行李，招呼着重新上路，一路上只是摇头说：“糟啊，先生娘，这年头儿比从前更糟。上个月英国人在重庆‘开红山’①，打死了四个，伤了一大坝。王芳舟那狗日的烂军阀还护着洋鬼子，重庆的工人和学生闹得好凶，他们自然是恨你们学生的。”

太阳升高了，滑竿又没有凉篷，宁儿受不了热，在我怀里只是哭闹，我们便赶到前面一棵大黄桷树下歇脚。玉璧和夏林早到了，像细娃儿一样在树丫上坐着。我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肚子的委屈。夏林听了连忙问丘八们抢了什么东西没有。玉璧听了只是冷笑：“他们还晓得学生是专门捣乱的么？”

我还在生气，玉璧却朗声说道：“玉屏，你看，快拢家了，青山绿水的，还是家乡好。”

我没好气地说：“好什么！吃的是苞谷红苕，看的是石头泥巴，恶霸当道，土匪成群，我讨厌这个鬼地方。”夏林在一旁，帮着玉璧逗我高兴：“大嫂，你不晓得，这两年有些变化呢！尤其是华蓥山那边，闹热得很。山下的大溪口、枧子沟和毛垭口都开起了炭厂、窑场和碗厂，工人和运力都有好几

千；每逢场天，那些炭啊碗啊石灰的都从我们黎梓卫的码头上船，场上会挤得你脚都立不稳哟。还有，华蓥山上也好嘛，去年冬天我约了四个人去打猎，两天工夫就打回三头野猪、一头豹子，差点拖不拢屋。那野鸡野兔多得撞脚，我们理都不爱理得。”

两个抬滑竿的也听出了神，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说：“山上好是好，就是土匪多。”

夏林说：“嗨，要看你撞到的是哪一伙。要是打散了的烂兵或者是那龙背上成了器的浑滩弟兄伙①，当然是说不得了。可是这两年，那些实在是活不出来逼上山去扯棚子的，也不少。说来你们不相信，今年我就碰到过一回，青天白日去卖了柴回来，半路上就遇到土匪。

两头路口一卡，就喊过路人站成两边，一边是入了袍哥的①，一边是没有干系的。我不想冒充，心想这几天的辛苦钱还不够他们填牙缝的，搞不好不死也要脱层皮。哪晓得他们挨一挨二地搜身完了，又把我的一块钱还给我，喊我快走，却把那一堆说是入了袍哥的人抢了个精光。那中间有人直叫唤，说咋个不认簧，我们是拿了言语‘善服’，亮了底的哟。那个为首的土匪头子说：你们有‘善服’，走到哪里都好说；他没得这份福气，走到哪里也没办法，就给他留些吧……”

夏林绘声绘色的，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离开家乡两年了，真可谓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这两年四川遇上了特大的旱灾，川北一带还遭暴风冰雹，庄稼只有三四成收获，灾民们饿死于路野，甚至有杀子而食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而此时的四川，军阀们已拥有十七八万条枪，拉起九个大山头，人人都想作四川王，为抢地盘打得昏天黑地。岳池县今天过狼，明天过虎，有个月竟换了好几任“县长”，换朝官儿刮层地皮，别说是县城了，就是许多乡场也被搜刮一空。

许多亲戚朋友来看我们，说起自家的情况，都直摇头。二姐夫说：“有这些军阀在啊，我们老百姓就不得安宁。眼下守着这一方的罗泽洲，更坏。两兄弟都抽大烟，强迫全县人民种鸦片；一年要征几年粮，稀奇古怪的捐啊税的多如牛毛。莫说是没家没业的，就是我们这些小户人家，也实在是交不起。说别人你们不晓得，石垭场的杜海金该有耳闻吧，交不起粮款被先关后吊，现在一家人不敢落屋。”婆婆抱着宁儿，也过来插话说：“晓得你们在京城读书开销大，是该早些寄钱去，只是屋里头实在是没得钱，留下的三十多石谷子，全遭烂兵们挑走了，还说没抵够粮款。你们还不晓得哟，院子里傅三爷一家，断了粮只有去吃观音土（白泥），五口人胀死了三口，现在傅三娘睡在床上，靠九岁的幺女儿每天讨饭回来养活……”

夏林也扶着他妈妈来看我们。老人家这些日子又是呕气，又挂念儿女，眼睛都哭瞎了，一进屋就拉住我的手说：“还是你们好，读着书，走得到大地方，莫回来，我们这旮旯留不得人，留下来的都活不出来……”

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的蹂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乱得不成样子。我却眼睁睁地一点办法也没有。想起玉璧在船上说的话，心中乱极了，只想早早离开这个鬼地方，眼不见，心不烦。

可是我没法走。回家的第二天，玉璧就带上我在南京买的一块呢料，说要上县城去看熊尧莫，还要到顺庆去办点事情，原说几天就回来，现在都快一个月了不见人影。眼看快开学了，黄明也没有信来，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我急得不行。婆婆一个劲地安慰我，说你们在城里朋友亲戚多，就